

我和我们，与文津讲坛的 1000 期之约

史楠^{*}

2019 年 12 月 10 日，文津讲坛推出了自己的整整 1000 期讲座。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作为文津讲坛曾经的听众、读者以及如今的合作者之一，我在这里谨分享一下，我与文津讲坛的三段故事。

文津讲坛秉承学人前辈传统，于 2001 年正式开办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候于校园中对学术学人无限憧憬的我，对文津讲坛的认知，至今仍不忘却的，有三个：

第一个印象是学术大咖多、咖位大。大学新丁当时的常见“毛病”，就是刚刚进入象牙塔之后特别憧憬那些学术大咖，对于讲座特别上心，而当时北大清华也举办众多讲座，也邀请了很多学术大咖前来，不过这些时间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固定，而我当时本科课程较多，这样时间上就会有冲突，而文津讲坛多安排在休息时段，与北大清华的讲座能够互相补充，这让我对文津讲坛的关注度特别高。当时，文津讲坛的第一讲就是由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来做的，而主持的则是国图的老馆长、著名学人任继愈先生。不过由于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如今发达迅捷，当我得知这些讲演消息的时候，早已经过了时间，并没有赶上这第一期，不过我和几个喜好聆听讲座的小伙伴依旧选择了从此之后“追讲座”。我还记得，那时候主办方就贴心地在讲演之后安排提问时间，跟我同行的小伙伴也由幸运举手得到交流机会的，可是我却总是心中忐忑，觉得只是一个本科就读的新生，而台上讲演的先生名气太大，始终都没有提起那样的勇气提问，后来才发现台上讲演的先生大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反倒是我想的太多，当时犹豫不决，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二个印象，就是讲座内容新、角度新、气魄大，当时张岂之先生做的首讲就是《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光是看这个题目就觉得特别有视野有广度。因为当时我没有赶上，所以这第一期以为只是个案，后来才发现，文津讲坛或追求新颖细微的观点，或追求宏观角度，讲座并非随意堆砌，里面是藏了选题策划的功力的。我也跟着过瘾，成了论坛的粉丝。当时跟着小伙伴们听完讲座，于回来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还会分享一下彼此的讲座心得，那也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妙经历。

第三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最直观的感觉：远，是真的远。——

^{*} 作者系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

一文津讲坛毗邻北海公园，坐落于因收藏四库全书而闻名天下的文津街上，而我当时从北京西北隅的北大校园出发，想来这里听一次讲座，并无如今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可以凭借，只能乘坐公交车经过一连串的著名的交通堵点：中关村、人民大学、魏公村一直到西四，这些都是无论平时上下班还是休息日都十分繁忙的路段。我每次在人满为患的公交车上昏昏然站着，心中却总是惴惴，因为总念着即将见到那些原本以为只能在书中见面的著名学人，那时候的我虽然也时常被繁忙的交通弄得心头火燎，却总能开朗起来。

这就是我这样一个当时文津讲坛的普通听众的心中所想。

而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我未来将要供职的光明日报，作为一张关注知识分子的文化大报，也从文津讲坛开办伊始的 2001 年 1 月，就在关注它、报道它。后来我加入报社后还专门搜索到了当年这一条新闻。如今想来，当时撰写发表关于文津讲坛开办消息的光明日报的前辈老师们，恐怕也未能料到，光明日报将会在未来与文津讲坛有着怎样的一个相逢。

而当 2006 年，我离开北大校门，走进光明日报的时候，又有幸在当年最受关注的新锐版面之一“光明讲坛”上，再度意外看到了文津讲坛的名字。此时的我，是一名刚刚进入报社的新丁，每日的任务之一，就是研习每天出版的光明日报，而阅读其中的“光明讲坛”版面，就是一个特别能满足我个人的“私心”的小享受——这时候的我因为初入报社，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承担的实习和锻炼的任务较重，因此已经不能再像大学时代那样有充分的时间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持续关注，文津街上的那个吸引了我好几年的讲坛，但是，一期不落地在“光明讲坛”上阅读精彩讲座文字版本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我曾经非常熟悉的文津讲坛与光明讲坛合作刊出的相关讲座内容，仍旧让我能获得一份仿佛来自老熟人特别提供的清热解渴的阅读上佳体验。那种意外之喜和会心一笑，至今让我难以忘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不知不觉间，也完成了从文津讲坛的一名听众到一名读者的身份转变。虽然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但是当时我在阅读“光明讲坛”转载的“文津讲坛”时，依旧秉持的是一个昔日小粉丝的路数，我关注的还是报纸上所记录的学人大咖的讲座内容干货和思想火花。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我还会再本职工作中与文津讲坛发生第三次交集。

到了 2018 年，我从其他岗位转到光明讲坛担任主编。从昔日的读者，正式转变为刊载内容的策划者、编辑者。从那时起，我所关注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小粉丝的范畴，作为主编，我需要让光明讲坛继承并发扬十几年来前辈老师们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同时也要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在原有的非常优秀的成绩基础上求新求变。在

这样的编辑思路转变中，我再次将目光转移到了昔日熟悉的“文津讲坛”。在此时的我看来，文津讲坛的专业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跟众多学者大咖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它与光明讲坛也有过多次良好合作，而且它的选题和策划独具匠心，并非是简单的内容罗列或者是讲座混搭，而是有意识地开展几个专题的相关内容的集合发布，这种编辑的思路和内容的参与，非常符合我和“光明讲坛”的胃口。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们起初与文津讲坛合作刊登的两期内容，很快就得到了包括《新华文摘》等知名刊物和一些流量网站的转载。

由此，光明讲坛再次迅速开展了与文津讲坛的合作。虽然名义上说是合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双方起初的合作还只是停留在诸多细节和流程上，比如由文津讲坛提供相关讲座的文稿或录音，而光明讲坛与讲座学者再合作进行文字二度编辑及版面呈现等等。

到了 2019 年 1 月，我才与文津讲坛这边的齐世峰老师正式对接上，而且这次对接，也是非常别致的，因为当时齐世峰老师正外派在美国出差，所以，当时我们进行的第一通电话联系是越洋电话。我们讨论的问题，头一个就是我们光明讲坛希望刊登一篇之前文津讲坛约请的学术讲座，而且有时间要求。远在大洋彼岸的齐世峰老师迅速联络其他同事与我们对接，并且很快就有了积极的反馈。其中反映出来的文津讲坛上下的工作效率和配合积极性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火烧眉毛的工作之外，在初次的通话中，我们也开诚布公地谈到了未来合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初次交流的我们，甚至对未来可能的更多合作方式进行了探讨。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坦率的交流，由此我们开启了更多的合作。而就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频繁交流，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合作开始走向深入。

可以说，我们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合作，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学术大咖的经典演讲实现文字重现，来一点一点夯实的。通过一年多以来更多更频繁的合作，我们也看到了文津讲坛上下同仁对讲座内容的精益求精、对流程细节的严格把握以及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不过，即便是正式合作了一年有余，当初我与文津讲坛方面探讨的更多合作方式和内容，还远远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来，我相信未来我们双方还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机会，比如在媒体融合领域、线下活动领域等等，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平台互相借鉴合作，联合出海，这样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个人与文津讲坛自 2001 年开始的各种奇妙缘分，必然会在未来光明讲坛与文津讲坛的不断深入合作中，演绎出更多的故事。